

刘福垣 著

明祖 正稅 除費

改革出版社

明租 正税 除费

刘福垣 著

改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租 正税 除费/刘福垣著. -北京:改革出版社, 1997. 5
ISBN 7-80072-991-5

I. 明… II. 刘… III. 经济-中国-文集 N. F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5375 号

责任编辑 安建军
封面设计 刘志豪
监督印制 柏争英

明租 正税 除费

刘福垣 著

改革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德里北街 23 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艺辉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850×1168 大 1/32 26.75 印张 700 千字

印数:1-2000 册

ISBN7 80072 991 5/F·591

定价: 68.00 元

自序

这部书是我十八年科研成果的一个全面系统的总结。

我的研究特点是从入门开始直到十八年后的今天，学术观点一步一个脚印，领域逐步拓宽。从活劳动成本要素研究上升到成本范畴整体的研究，从微观成本上升到宏观成本的研究；从成本上升到价值，论证了价值价格公式，从价值上升到价格，论证了市场价格的理论公式，从价格上升到工农产品比价剪刀差；从价格剪刀差上升到工农业投入产出差异；从产出差异挖掘投入差异；从投入差异上升到生产资料占有差异，上升到公有制实现问题；从生产资料占有差异上升到劳动力必须异地转移问题；从劳动力转移方式再上升到全方位开放式效益型城市化战略；从城市化战略上升到区域经济结构中的同构病大而全小而全研究；从区域同构问题再上升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对外开放全方位开放战略研究。其中一以贯之的一条红线完全是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和基本原理。

我治学的态度受孙冶方老前辈影响很深。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用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剖析中国现实，以彻底唯物主义精神勇于探索，求是求真，求异存同，是孙冶方倡导的治学精神。科研是创造性劳动，理论研究工作探求经济规律，提出科学对策，不是图解即定政策，而是要指导政策的制定，只做政策宣传这不是创造性劳动，不是搞科研。搞科研要以事实为依据，诚实地探索，勇往直前。科研无禁区，宣传讲策略守纪律。理论必须彻底，不彻底政策必然左右摇摆，不能搞实用主义，更不能指鹿为马。多

年来，我不搞应景之作，每一篇东西，都是诚实研究有所得的结果，都必须有独到见解，人云亦云，东拼西凑，重复劳动的事我坚决不干。

我认为求同存异，是学术上的腐败，求异存同是学术研究的正道。求异不是标新立异而是求真求实，求规律，只有求异才能化异为同，获得真正的认同。我认为学术讨论是从求异存同到破异立同的过程。我偏找不同观点的人讨论，不怕对台戏，也不怕学术上的孤立，不交火、没焦点的研讨会我坐不住。本书的每一章节都是为学术争鸣而作的，在求异中探索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对策。

我的学术研究是以农产品活劳动成本开始的。一个活劳动成本要素集中反映了工农城乡，国民经济一切矛盾。通过活劳动成本经济本质的分析，把农业劳动力再生产费用的形成，工农关系、国民经济部门联系平衡，价值转移等一系列问题都揭示出来，对当年人民公社分配体制的要害，对工农业收入差异，国民经济基本矛盾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独到见解。

本书奉献给读者的主要观点可分四个方面 25 个小点：

（一）成本学研究的新观点

1. 提出建立以成本范畴为基础的经济学新体系，从根本上改造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我编写并讲授了第一部经济学意义上的成本学讲义。成本首先是经济范畴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经济关系集中的理论表现，然后才是统计范畴会计范畴。中外所有经济学教科书把成本都只作为统计范畴作为经济核算指标，放到经济核算一章去讲。把成本主要作为经济范畴无论在经济管理上、学术上，还是实践上都有重大的意义。使它成为指导宏观经济管理、企业管理，分析产业结构利益分配关系与机制运作状况的试金石。一个产品的成本就可综合反映整个经济机体、一切矛盾运动的状态。成本是经济机体的全息图象，微宿景观。前人对此没有足够的重视，没有从宏观意义上使用过成本概念。

2. 指出学术界对《资本论》关于成本的误解,科学论证了成本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范畴,只要有商品货币关系,就有成本范畴。个体经济、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企业中都存在C+V意义上的完整的成本范畴,不以人们计不计算,如何计算为转移。

3. 首先使用活劳动成本的概念,并指出个体经济、集体经济活劳动成本的本质是劳动力再生产费用。提出并论证了标准劳动日劳动力再生产费用(即人工单价)的计算公式 $V = \frac{W_1}{306A}$,该公式1979年首先被农业部采用,后来各部门陆续采用。为推动农产品成本核算作出了贡献。

4. 揭示了人民公社体制下生产队工分值的经济本质,指出所谓劳动日报酬P是社员两种收入的和。 $P = V \pm M_x$,V为补偿社员耗费的劳动力再生产费用,+ M_x 是按劳分配得到的利润,- M_x 作为主人分摊的亏损。

5. 揭示了按劳分亏是集体经济再生产过程中走向反面的内在原因。由于在生产队分配关系上社员劳动力再生产费用没有独立的表现,没有工资范畴,在当年宏观环境不利的情况下,按劳分配在大多数亏损的生产队中实质上变为按劳分亏按劳扣除。集体经济内部劳动者对公有生产资料具有等量占有权,因而对集体、社会的责任也应是等量的。等量扣除才能保证等量占有,按劳扣除,必然使内部产生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劳动的问题,使集体经济走向反面。所以应把原集体经济分配的倒轧账颠倒过来,必须先计算成本,补偿劳动力再生产费用,再按劳动量分配利润,按劳动力作等量社会扣除和分担亏损。

(二) 关于工农关系研究的新观点

对1978年到1992年国民经济中五大物质部门价值、价格、成本利润关系进行跟踪性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新成果。

6. 在剪刀差经济本质和实体研究上有重大突破。人们对剪刀

差的经济本质认识十分含混，长期使用没有实体的价格指数剪刀差，后又把比值差作为剪刀差的实体。剪刀差的经济本质是工农两个产业不平等不合理交换关系的理论表现。指数差、比值差都不能说明现实交换关系是否合理。交换是实现问题，合理的价格既要体现价值，又要反映供求。客观标准是成交价格必须符合另一种含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以剪刀差的实体是比价差不是比值差。农产品在供不应求的条件下应该高于价值出售，比值差往往掩盖供求不平衡条件下的剪刀差。

7. 否定了中苏学者沿用多年的用“可比劳动力法”确定比值差的传统理论，指出其违背价值规律的要害所在。可比劳动力法把所谓可比劳动力混同于可比劳动量。工农业的具体劳动是不可比的。所谓可比劳动力法实质上是按平均工资利润率 $\frac{M}{V}$ 来分配利润。这不是确定价值而是设计一种理论价格。在工农业成本构成 $\frac{C}{V}$ 不等的条件下， $\frac{M}{V}$ 是不可能相等的。使用可比劳动力法的人们没有剔除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人为夸大了农业创造的价值，夸大了剪刀差。在政府几乎是年年提高农产品价格的条件下，他们计算的剪刀差每年都是以200多亿元的幅度上升，而这正是农业人口每年以1500万增长的一种反映。这根本不是价格和农业交换地位的问题，是产业结构，人口布局问题。

8. 澄清了因一字之差引起的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解上的混乱。《资本论》第三卷207页上一段话被主张第二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或参与决定价值观点的人经常引用。我经过对《资本论》原文的反复推敲，发现有两处价值一词不过是价格一词之误笔、误印而已，这个发现彻底否定了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参与价值形成有关的观点，这不过是对马克思教条主义理解的产物。只有大家都认同第一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第二种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格，我们才有条件去讨论现实生活中的价值、价

格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否定以价值价格为合理价格标准的传统观念。用“可比劳动力法”测定“剪刀差”实体也就失去了理论前提，剪刀差之谜在理论上就彻底破除了。

9. 解决了价值价格的计算问题。根据马克思《资本论》对价值结构变化的论述和现实经济分析我提出了并论证了产品价值价格的计算公式： $P_w = K + \sqrt{CV}$ 或 $P_w = C + V + V \sqrt{\frac{C}{V}}$ 、 $M = \sqrt{CV}$ 。这个公式的理论意义是：商品的成本价格及其要素构成决定商品的理论利润 M ，从而决定商品的价值价格。解决了价值价格的计算问题，也就解决了合理价格的计算问题即 $P = \frac{W \cdot D}{S}$ ，从而解决了剪刀差的计算问题，解决了国民经济五大物质部门部门间价值转移的定量分析问题。在此基础上我对 1978-1992 年五大物质生产部门价值形成与实现的分析填补了研究的空白。

10. 在学术界首先提出并系统研究了工农业收入差异这个经济范畴。1984 年以后从总量上看中国已经没有剪刀差和剪刀差政策，农业获得了包括地租的超额利润已是客观事实。但剪刀差扩大的呼声却日益强烈。剪刀差之谜已经严重影响工农关系的调整，而人们对剪刀差的认识一时难以统一。仅仅靠剪刀差一个经济范畴也不足以全面反映工农两业分配关系。为从根本上破除剪刀差这种拜物教式的迷雾，补充剪刀差研究的不足，我提出从投入产出关系判断工农两业分配关系，使用了工农业收入差异这个经济范畴。工农业收入差异是工农两业收入分配关系集中的理论表现，作为经济指标它是以等量投入角度来考两个产业收入关系的观念总结。这个经济范畴的发现，具有重大的学术和实践价值，它将成为国民经济资源配置分析，宏观经济研究的重要工具，经过几年的研究我取得不少可喜的成果。

11. 揭示了工农业收入差异产生的三个不同原因和三个组成

部分：(1) 由产业结构不合理产生的结构性收入差异；(2) 由有机构成，成本构成不同产生的构成性收入差异；(3) 由价格不合理产生的比价性收入差异，它是剪刀差的实体。我研究的结论是：(1) 结构性收入差异是合理的。《史记：货殖列传》上司马迁早就指出：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又不如倚市门。”这两个不如是存在了三千多年的历史现象，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动力。从定性定量两个方面把结构性收入差异和比价性收入差异区分开来，发现 1984 年之后比价性收入差异已是负值，结构性收入差异还在扩大。(2) 比价性收入差异是不合理的，可以通过调整价格政策和改革价格形成机制来解决；(3) 构成性收入差异是两种生产方式的矛盾，只有加速农业生产方式转变才能缩小。结构性收入差异、构成性收入差异都是发展问题，不是改革问题。

12. 揭示了工农业劳动者收入差异，农民收入低的深层原因是资源分配不合理。目前工农业 $\frac{C}{V}$ 有 5 倍以上的差异，在生产资料分配上农民占用少，工人占用多。农业劳动者由于人均耕地少，每个劳动力年投入劳动量只有 77 个劳动日，工业劳动者一年法定劳动日（双休制前）为 306 个，扣除虚费也有 280 个劳动日。投入量是 1 : 3.6，收入比自然不应低于 1 : 3.6。分配首先是生产资料的分配，要提高农业劳动者收入只有减少农业劳动者，提价反而是逆调节措施。

13. 把农业拖工业后腿这种颠倒了的历史关系颠倒过来，平了农业基础薄弱的冤案。通过工农业收入差异研究我发现，中国从微观上看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存在落后的农业和先进的工业的矛盾，小生产和大市场的矛盾；但从宏观上看，中国目前经济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农业和落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矛盾。农业落后的根子不在农业内部，微观上落后的农业是宏观上落后的工业的产物，是工业结构性自我循环性落后拖了农业的后腿，是城市

化水平低，人口布局不合理造成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的本质含义是为社会分工提供剩余劳动量劳动力，中国农业为国民经济提供1—2亿的剩余劳动力，说明这个基础是很雄厚的。如果工业城市吸收了1—2亿剩余的劳动力，中国农业的生产方式目前就可以转化，实现企业化专业化经营。农业内部人地矛盾就可化解，农业劳动者收入就会成倍提高。从而揭示了中国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的深层原因，把长期被颠倒了的工农关系从宏观上又颠倒过来，这在理论认识上是一重大的突破。这种观念的更新如成为全党全民的共识转化为政策，我们就可以集中力量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力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放开城门让农民进城建城，摒弃就农业抓农业，单一作价格文章的老路。

（三）关于经济改革与发展问题的新观点与对策

14. 只有减少农民才能真正保护农业。我全面系统地研究了由2.6亿小农户组成的中国当前农业经济，指出农户经济仍然是以简单再生产为特征的，它的流通公式是为买而卖，它的流通规律是买难卖难：它的人口规律是多生男丁。保护这种小农户就是保护落后，保护小农经济抑制农业生产方式转化，只有减少农民才能保护农民保护农业；小农户是农贸市场的主体，只有分化之后才能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

15. 指出亟待制定有效的农业保护政策。我们保护农业的政策从生产流通到分配消费制定了许多具体政策，但执行起来常常走样。最根本的原因是生产、流通体制转轨时期分散多而杂的政策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经济关系，可操作性差；执行政策的机构过多且政企不分，难以明确职责互相监督。建议制定单一农产品储备基金及其使用政策，与农业产供销相关的所有政策目标都可以由这一个政策来完成。指定一个部门来承担农业保护政策的执行，免除其他一切涉农单位保护农业的责任。建立这种单一的农业保护政策才是最有效最有力的农业保护政策。

16. 提出并论证了粮食商品率是划分农业发展阶段的主要指标。农业发展战略阶段的划分既不能以公元纪年整数年代为转折点，也不能以我们的计划期为标志，而应以反映农业生产方式质的变化阶段的几个粮食商品率指标（50%，75%，95%，100%）为标志。

17. 指出 1985 年以后农业的徘徊是改革徘徊的产物，“四靠”不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充要条件，农业需要新的政策投入。日本农业是四靠最典范的农业，把大米价格靠成国际市场的六倍，把农业靠成副业农业，星期天农业。中国决不能走这条路。一定要把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加速土地集中，加快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摒弃离土不离乡的转移方针，大力发展中等城市。

18. 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对象是政府行为，不是企业和农户。政企分开、政社分开的关键在政府，必须采取整体改革思路。企业改革的提法是不科学的，试点不是政企分开的路子。公社生产队的问题不在统一经营，而在于政社合一，尚失了自主权；国有企业问题的根子也是政府。只有改革政府职能，企业和集体、农户的生存境变了，才真正成为经济实体。由于没抓住改革的根本问题农村改革只给了农民一半的自主权，同时极大的削弱了集体经济，制造了 2.6 亿小农户；国有企业改革久攻不下效益下滑。实践已证明无论农村还是城市改革只对微观组织使劲，在方向上是有问题的。近年来政府职能改革不进反退，松开的绳索又变紧了，企业和农户负担沉重，还象笼中鸟。

19. 提出了从根本上理顺政府、企业、农户关系的明租、正税、除费的六字方针。企业、农户负担重的根子在费不在税。收税是政府行为，收费是商业行为。政府为纳税人服务应是无偿的。（1）我们必须下决心正税除费。把政府为企业和农户服务必须的合理的费用一次性纳入税制，由一个部门收税。（2）理顺社区和农户的关系必须明租除费。取消提留统筹，明确地租范畴，根绝

乱收费的制度因素。农户交税完租，不再负担任何非经济强制性费用。(3) 理顺国有企业和全民的关系，也要明租，国有资产有偿使用。当前最大的分配不公是全民公有生产资料占用不公。各种劳动者收入差异主要是由生产资料占用的数量和质量差异造成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首先坚持按要素分配的原则，否则就必然会使工资侵蚀利润或利润侵蚀工资，全民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在分配关系上就没有实现，全民生产资料客观上落到企业经营者手中，实际上剥夺了九亿农民对全民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国有企业分配体制改革的公式是按要素分配、等量扣除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现有生产关系下工资属于按劳动力要素分配的范畴，按劳动量分配的对象只是等量扣除后的部分利润，主体只能是公有制企业（使用公有生产资料的企业不一定是公有制企业）中的就业人员，而不是只占用公有生产资料的人们。这个公式从根本上解决了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关系。我个人认为这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20. 提出用宏微观成本利润率差异和失业率代替近年来经济形势景气判断的指标体系。(1) 取消微观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形势概念，恢复国民经济形势的概念。微观加总反映的已不是微观而是总量宏观了，是宏观的全息反映。微观只能指个别企业，不能指全体企业。(2) 经济增长速度，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通货膨胀，这三个指标都有问题，基本不能用。判断经济形势无论什么层次的形势都必须用有关经济效益运行质量的指标。增长速度快慢、投资规模大小都和经济运行质量无必然联系，关键结构是否合理，结构合理效益就好。物价指数对转型时期的经济来说不是通胀率。我们的商品价格、货币关系还是混合物，不是完全市场机制下形成的。昨天的价格和今天的价格没有可比性，不是同质的东西，孰高孰低无以为凭。价格已不是那个价格，货币也不是那个货币，越来越象，但还不是真正的价格和货币。把双轨制价

格和原来的法定价格对比，把市场机制程度不同的价格互相比较这是人们习惯思维在作怪。(3) 我主张用宏微观成本利润率差异作为判断经济形势的主体指标。宏观成本利润率是以全社会为耗费主体来计算的，微观成本利润率是以企业为耗费主体来计算的。社会总产品的宏观成本利润率一般小于微观成本利润率，两者差异的绝对值越小，产业结构越合理，失业率越低，经济运行质量效益越好，反之则反。

21. 我指出中国最大的发展问题是同构病。各级政府不管多大个地区制定计划都以大国之君自居，都搞退二进三，产业升级，三个产业全面发展，大而全，小而全、自求平衡。因而全国上下各个层次形成了类似一袋马铃薯的结构。这是国民经济运行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我提出互补才能共荣的对策。在区际之间强调结构互补，全方位开放，杜绝只讲对外开放，不讲对国内周边开放的战国策。没有互补结构就没有市场，不能搞没有市场的市场经济。从大跨度空间看问题，上海和香港也有个分工互补的问题，也不能同构，不要搞 $1+1$ 小于 2 的事。上海香港一定要互补不要互相取代。国外有人宣传上海要取代香港，我们不要上当。尤其上海要主动表态，自觉在结构上“二”重一点，金融中心的级格比香港低一点，这大有好处。宁波和深圳都要为自己定好位，正确处理和上海香港的关系。各开发区，各地区都要做好定性定位，定功能，定结构的工作。四定才能全方位开放，全方位思维。

22. 针对一些人以入关为由提出特区过时论，主张用产业政策代替地区政策的观点，我全面论证了特区与普区发展的辩证法，科学界定了产业政策和地区政策调节的不同层面，指出它们不能互相替代而应有机结合，特区还要特下去。特殊政策不是优惠政策，把特殊政策变为优惠政策是执行中的问题。

(四) 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见解

23. 提出了失败的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不会失败的观

点。苏东剧变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他们原来就不是社会主义，在那里早就没有真正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苏东的党和政权经济制度早就变质了，波兰团结工会反对的是假社会主义，不是真社会主义。

24. 从分配角度给社会主义下定义：社会主义就是剩余价值归社会占有的主义。归什么范围的社会公有，就是什么范围的社会主义。剩余价值归社会占有的度是社会主义的纯度。一个国家剩余价值的大头归社会占有为全民造福，这个国家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剩余价值的大头归私人占有就是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个很严肃的重大政治原则问题。

25. 提出两个空壳论，破除了所有制的迷雾。西方某些发达国家的土地私有制已近于空壳，一般生产资料私有制由于遗产税等也有空壳化倾向；而我们国家土地公有制近于空壳，其他生产资料公有制空壳化也很严重。这是应引起我们高度警惕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在生产社会化的推动下，资产阶级不自觉地通过法律形式逐步把土地私有权的一束棒抽空了。私人逐步丧失了他自己占有土地的处置权，只能在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的前提下来使用。客观上土地所有权在向社会所有过渡。政府利用税的形式把资本家从工人身上剥削到的剩余价值越来越多拿走，越来越多地用于社会公益事业。近几十年西方劳资矛盾的缓和，长期没爆发阶级对抗的革命和这一点很有关系。而我们国家公有制空壳化日益严重，国有生产资料无偿低偿使用，一些占领制高点部门经营权的人这些年发了大财。他们实际上占有了全民所有的剩余价值。银行保险部门尤为突出。

指出分配对谁有利就是谁的所有制，提醒人们重视公有制的实现问题。进一步破解了中国国有企业大面积长期亏损，银行存款却直线上升，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消费膨胀的迷雾。这是公有制没有完全实现，“工资”侵蚀利润，企业空壳化造成的。以

财政部国资局为核算主体，确实存在大面积亏损，国家得到的税利很少，占国民收入近几年只有百分之十几，但以企业、以部门、以企业经营者为核算主体，情况大不相同了，亏损面大大缩小。从经济学意义上严格规范许多企业和银行机构实质上已是私人或集团所有，甚至成了毫无生产性的寄生社团。物质不灭，全社会劳动者创造的财富大多留在中国国土上，只是分配不公，分配方式扭曲，大多数人多多少少都有某些灰色收入，只有少数地区少数人口相对或绝对贫困化。所以才出现国企大面积亏损和市场繁荣共存的局面，把一切难题都留给了中央政府。国民经济实力确实在不断增加，但暗藏着巨大危机。空壳化是体制病不是精神病，不是人们信不信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问题，而是公有制实现形式在瓦解公有制。不动真格的改革，总有一天会重演苏东的悲剧。目前的既得利益者将成为最没有利益者。真改革对大家都有利。改革不能停，转轨期不能拖得太长。只要政府职能做实质性改革，我们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而徘徊不前，盲目乐观、安于现状是危险的。

这四个方面 25 个新观点集中起来总的对策结论是明租、正税、除费六个字。我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本质是经济利益分配关系的调整，改革对象是政府职能政府行为。明租、正税、除费是理顺一切分配关系转换政府职能的决定性的对策措施。实现了这六字方针，经济体制转换、政府职能定位、理顺分配关系真正实现公有制的改革任务就基本完成。实现了明租正税除费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农村和整个国民经济基本矛盾问题、两元机制、双重道德标准问题、寻租、腐败的制度基础问题都将迎刃而解。这就是本书以明租正税除费这个看起来令人费解的名字问世的由来。

1996 年 11 月 27 日于宁波





作者小传

刘福垣，1944年9月2日生于黑龙江省依安县一个务农的铁路工人家庭。197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先后在牡丹江市和齐齐哈尔铁路局任中学教员、党校和五七干校教员。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学位。1981年获硕士学位，留本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1982年晋升助理研究员，1985年起任综合室副主任，1986年破格晋升副研究员，1988年起任副所长。1989年获博士学位，兼任研究生院农经系主任。1991年任院学术秘书，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当年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2年晋升研究员。1993年秋调到国务院特区办公室任研究室副主任。1995年6月起任宁波市副市长。公开发表论文和研究报告近百篇，专著有《工农业收入差异》和《农村改革新方略》。